

云冈石窟的对外影响问题

韦 正 马铭悦 崔嘉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 本文从探讨河西北魏石窟与云冈之关系、平洛道石窟与云冈之关系、云冈三期洞窟与龙门石窟之关系三个方面出发,阐述了云冈石窟的对外影响问题。具体来说,河西石窟中不排除有北魏平城时代的遗存,也有很多内容可以推定在北魏洛阳时代,但均不能建立与云冈的关系。平洛道上小型石窟伴随着迁洛而出现,接受云冈影响的时间可能在迁洛之后。云冈石窟第三期表现出很多新特征,其近源在龙门,远源则在栖霞山石窟。总之,云冈石窟的对外影响问题需要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进行具体评估,所反映的情况不只是石窟本身,更与历史状况和自然地理之间存在关联。

关键词: 北魏 云冈石窟 河西石窟 龙门石窟 栖霞山石窟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xi Grottoes and the Yungang Grottoe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mall grottoes on Pingluo Road and the Yungang Grotto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ungang Grottoes Phase III and the Longmen Grottoes.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Specifically, the Hexi Grottoes do not exclude the remains of the Pingcheng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re are many contents that can be presumed to be in the Luoyang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ut none of them can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Yungang Grottoes. The small grottoes on Pingluo Road appeared along with 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ang, and the time to accept the influence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may be after 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ang. The third phase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shows many new features. The near source is Longmen Grottoes, and the far source is Qixiashan Grottoes. In short, the external impact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needs to be assessed in detail with changes in time, space and conditions. The situation reflected is not only the grotto itself, but also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natural geography.

Key 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Yungang Grottoes Hexi Grottoes Longmen Grottoes Qixiashan Grottoes

云冈是中国东部地区最早的石窟,对此后中国石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宿白先生对此有提纲挈领的表述:“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半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

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1]宿白先生的表述时间为1987年,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宿白先生的表述依然高屋建瓴。在这三十五年间,中国石窟材料得到更多地公布,石窟寺考古及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也有所革新。宿白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巨大影响的总体判断依然有效,但一些具体问题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揭示这些复杂的情形,



图一 天梯山石窟第1窟中心柱
正面下层龕外右侧第2层说法图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云冈对外影响的实际状况，对中国石窟之间的关系有更辩证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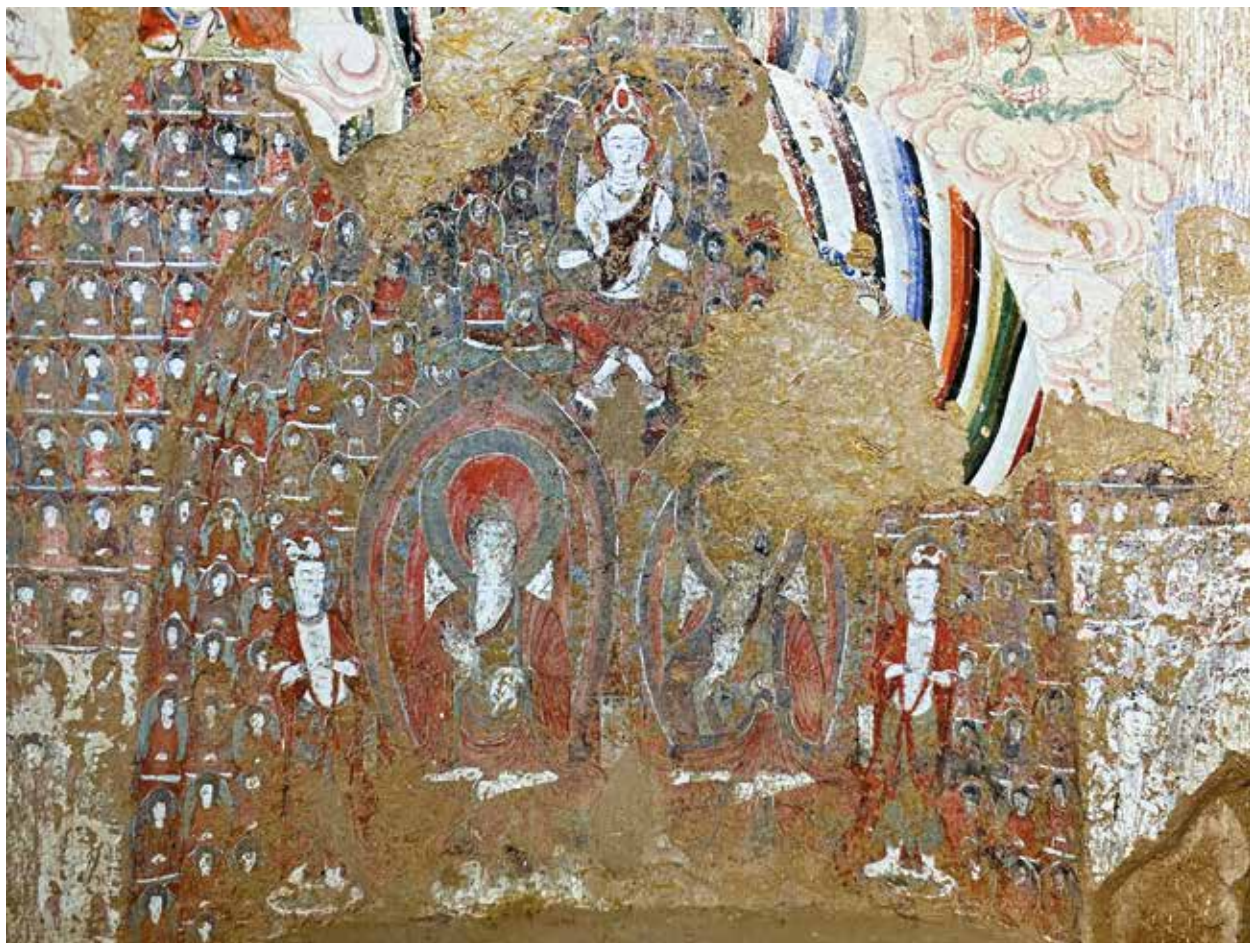
云冈的对外影响可分为直接和间接影响两种情况。直接影响即其他石窟与云冈石窟有明确的继承关系，龙门石窟交脚弥勒大龕和古阳洞的多

数大龕、庆阳南北石窟寺的七佛窟、义县万佛堂西区第1、4、5、6窟和东区第7窟属于这种情况。泾川王母宫石窟更是直接模仿了云冈第6窟。一些小型石窟如甘肃合水保全寺和张家沟门石窟、河北宣化下花园石窟也是云冈直接影响下的产物。间接影响即某些石窟先受到云冈影响然后又影响到其他石窟，如龙门先接受云冈影响，然后又影响到其他石窟，这从原则上来说仍然可看作云冈的影响，但由于龙门在接受云冈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他地区的影响，甚至还发展出了自身特色，受到龙门影响的其他石窟的面貌与云冈已经难觅共同点。在这种情况下，再笼统地谈云冈石窟的影响有失之于浅之嫌。有鉴于此，本文拟讨论三个相关问题，以期对北中国早期石窟寺总体状况有更客观全面稳妥之认识。

一、河西北魏石窟遗存与云冈之关系

河西石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尤其是河西早期石窟，不论具体的时代，还是与其他石窟的关系，几乎都存在不同的看法。这里不准备讨论那些有争议的石窟，只涉及意见比较一致的北魏时期遗存，这些遗存包括武威天梯山诸窟中北凉壁画之外的北魏壁画，张掖马蹄寺第1、2、3、4、8窟中的北魏壁画，酒泉文殊山前山万佛洞、千佛洞和后山千佛洞、古佛洞壁画，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即所谓“北凉三窟”之外的北魏诸窟。由于新疆以东地区河西最早出现佛教石窟，且出现年代为十六国晚期。上述河西诸地北魏遗存与十六国遗存面貌差异大，甚至形成断层。这些北魏时期遗存部分学者认为与云冈关系密切^[2]，其实多不及与龙门石窟之关系密切，下面略作检讨。

上述河西北魏诸窟均无明确纪年，但均可通过比附将相关石窟年代推定在北魏，但能肯定的多是北魏洛阳时代，是否能到魏平城时代需要再斟酌，下面作简要说明。武威天梯山石窟中，第



图二 张掖马蹄寺第 8 窟中心柱南向面下层龕内壁画

1 窟中心柱正面下层龕外右侧第 2 层说法图可以判定为北魏洛阳时代，依据是菩萨形态秀骨清像之外，还穿交叉式披帛（图一）。以此为依据，可以将天梯山其他壁画多推定在北魏洛阳时代。张掖马蹄寺的情况与天梯山很相似，第 8 窟中心柱南向面下层龕内壁画以千佛为背景，在中间位置为二佛并坐说法，二佛上有交脚弥勒菩萨，两侧有胁侍菩萨，从题材和布局看，与云冈很相似，但胁侍菩萨都是秀骨清像，也穿交叉式披帛（图二），也属于北魏洛阳时代。那么，这种形式是否可能从云冈传去，从而视为云冈对外影响的一部分。本文认为，云冈的这种形态和服饰特点也是从龙门传入的，详下。因此，作为云冈的影响来看是不及作为龙门影响来看合适的，而且龙门不乏交脚弥勒和二佛并坐。酒泉文殊山前山万佛洞中心柱南向面佛龕两侧菩萨为秀骨清像式，时代

也以北魏洛阳时代甚至更晚点为宜。敦煌的情况略特殊，因为第 285 窟有西魏大统（535—550 年）年号，其他被推定为北魏时期的诸窟与第 285 窟人物的形态服饰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所以推定为北魏时期是可靠的，但首先要考虑的是靠西魏近的北魏洛阳时代，然后再是更早的北魏平城时代。敦煌莫高窟存在北魏平城时代窟，但莫高窟只在西魏或略早可以看出受到东部地区文化而不一定是石窟的影响，更早的石窟看不出与东部地区的关系，更不用说受到云冈的影响^[3]。根据上面的分析，河西石窟中不排除有北魏平城时代的遗存，但看不出与云冈的关系；河西石窟中很多内容可以推定在北魏洛阳时代，自然与云冈石窟也没有关系。这个现象就不只是石窟问题，而必然也与历史背景之间有一定关系了。

从历史背景来说，除敦煌外，河西其他地方

遭受北魏攻占的重创,“(凉州)沙门佛事皆俱东”^[4]是很好的注脚,佛教如此,当地人口、经济上遭受的劫掠要更深重。佛教石窟营造颇需人力物力,河西地区在北魏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和发展佛事实属自然,这个现象可用墓葬来辅助说明。河西地区魏晋墓葬很多,五凉墓葬也不少,北魏墓葬则屈指可数,便是河西进入北魏后严重凋零的表征。河西之不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北魏平城时代对西方交流可以通过草原之路更便捷地实现,而不必一定依赖河西。北魏都城平城本身就是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大约与北魏同时兴起的柔然政权控制了欧亚草原东部广大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交通。在大同发现的好几批鎏金铜杯、银长杯、银盘、玻璃器,在距大同不远的内蒙古正蓝旗伊和淖尔北魏墓发现的银碗,多数是东罗马制品,在萨珊波斯阻止东罗马经沙漠之路与东方交通的情况下,大同及附近地区的这些东罗马物品只能通过草原之路而来。但定都洛阳后,北魏对外交通的形势已很不同于定都平城,这个时期北魏只能主要通过沙漠之路与西方交通,河西的地位必然因此而上升。

河西地位在北魏迁洛以后的上升,与敦煌从孝文帝时期格外受到重视有密切关系。宿白先生对敦煌地位的变化有深入论述,其大意是:北魏攻占河西后,敦煌成为北魏经略西域东部的基地,在5世纪50年代之前是北魏积极进取的时代;从50年代至70年代,是柔然威逼敦煌,北魏试图放弃敦煌移镇凉州的时代;80年代开始高车强力牵制了柔然,敦煌进入安定时期,既解除了西部柔然的威胁,又加强了与东部的联系,长乐王穆亮在485年作为见于文献的最早的敦煌镇都大将被孝文帝派遣到敦煌,此后驻节敦煌的官员身份都很高,东阳王元荣是其代表^[5]。宿白先生整理敦煌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说明所谓“北凉三窟”的年代可能产生于太和年间,其他北魏洞窟产生的年代要更晚点。关于“北凉三窟”的年代,我们觉得可能比宿白先生估计的还要早点,至于敦煌

其他北魏洞窟,数量大、成系列,没有连续稳定的外部环境的确难以出现。敦煌地区的这个情况,可以作为河西其他地区的参考。事实上,从已经公布的材料看,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几乎没有可以肯定的北魏平城时代开凿的洞窟,北魏壁画与北凉壁画形成明显断层,这既可说明三地石窟活动恢复之晚,也力有不逮。要言之,河西石窟不能轻易建立与云冈的关系。

关于敦煌莫高窟,还有必要再作点阐释。敦煌获得安宁从5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莫高窟完全有可能从此进入兴盛期,其时在孝文帝迁洛之前,似乎与云冈关系就不一般了,如宿白先生就认为莫高窟第275窟与云冈第7、8和9、10两组窟接近^[6]。对此我们的意见也有所不同。第275窟基本可以纳入到敦煌北魏洞窟序列中,敦煌北魏洞窟的基本特点是前室为人字披,后室有中心柱,窟内和中心柱流行阙形龕,这些情况绝不见于云冈,也不见于其他地区,而是敦煌当地的发明。敦煌及附近地区有足够的资源用以兴造石窟,而不必外求于云冈或其他地区。宿白先生曾列举若干具体例证来说明敦煌与云冈之间的联系,这些例证包括:莫高窟第125~126窟间裂缝沙土中发现的太和十一年(476)的刺绣、敦煌出土的五级和多级方形石塔、莫高窟第257窟南壁沙弥守戒自焚壁画中的单层塔、第254窟南壁萨埵太子本生壁画中的三级塔等都是中原塔式。根据这些例证,宿白先生在论述云冈的对外影响时,才有“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的判断。我们认为这些细节性的例证基本上无助于说明莫高窟受到云冈的影响:绣佛的存在只能说明这件刺绣来自平城,中原式佛塔也非云冈独有。当然,我们不否认敦煌与平城之间的联系。其实,从细节上来说,莫高窟与龙门的不少因素很接近,最显著的就是秀骨清像的样式,但我们同样不认为莫高窟受到了龙门石窟的影响,而可能只是时代风气导致了莫高窟菩萨、供养人等形体、服饰特征的变化。

上面牵涉到的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认定石窟之间彼此有关系。一个石窟是由形制和造像两大部分构成的。形制属于结构性特征，具有深层次的隐喻含义，虽然今人已不易明了，但形制的相似往往表示彼此之间具有关系。造像可分为题材及题材所构成的组合和布局、造像装饰两大部分。题材及题材组合不仅与石窟思想有关，也与石窟形制之间具有关联性。造像装饰属于相对外在的内容，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快速地变化，单独用装饰来讨论不同石窟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慎重的。石窟形制、题材与题材所构成的组合和布局、造像装饰构成相关的三个方面，在反映石窟相似性的能力上依次降低。此外，某个石窟的特殊内容，如果在另一石窟中出现，则也可推测彼此之间具有联系。以此进行检验，敦煌莫高窟连云冈石窟的间接影响都谈不上，虽然最早的“北凉三窟”的年代很可能在云冈“昙曜五窟”开凿前后。

因此，可以确认与云冈石窟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龙门古阳洞佛龕等。古阳洞与云冈的关系是由迁都引起的^[7]，庆阳南北石窟寺和泾川王母宫与云冈的关系是由供职北魏朝廷达官显宦主要为政治而非宗教目的引起的，这些具有特殊性。义县万佛堂等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情况。万佛堂出现于义县是任职于那里的北魏高官模仿云冈而开的，合水保全寺和张家沟门石窟、宣化下花园石窟等几处小石窟是从平城到陇东或到辽西的路途上洒落下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石窟的年代多在迁洛以后，这就迫使我们考虑云冈对外产生影响的情形。我们不否认迁洛之前云冈可能对外产生一定影响，也不认为云冈之外地区在迁洛之前不能出现石窟，但云冈属于皇家石窟这一性质可能并不有利于其对外产生影响。云冈第三期洞窟数量猛增，云冈附近出现的小型窟基本属于第三期，都是云冈从此前的皇家性质窟中“解放”出来的标志，其他地区出现的与云冈类似的石窟大概也是这个情况下产生的。鉴于这

个情况，我们更难以认为包括莫高窟在内的河西地区北魏石窟与云冈有关。

二、平洛道石窟与云冈之关系

孝文帝迁都洛阳，龙门随之出现大量石窟，这些石窟自然与云冈石窟有密切关系，通常都将其视为云冈石窟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迁洛之事，龙门未必会出现很多北魏石窟。这种随着迁都而出现的石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偶然性，与石窟文化的自然传播不太一样，这是不可不考虑到，这牵涉到对平洛道上石窟的理解问题。

迁洛以后，平城与洛阳之间人员往来频繁，由此导致平洛道上遗留下可观的中小型石窟。这类小石窟的数量随着近年国家对石窟寺考古的重视，随着山西省大力开展石窟寺调查工作而在持续增长之中。但关于这类小石窟的分布状况、年代和价值问题，李裕群在较早阶段进行的研究已作了相当透彻的阐释，值得转引。对于这些小型石窟的总体情况，李裕群说：“据文物普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全省石窟及摩崖造像约有三百余处，除著名的云冈石窟和天龙山石窟外，山西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小型石窟。这些石窟大都开凿于北朝时期，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晋中和晋东南地区。这一地区是连接两个石窟寺开凿中心——平城和洛阳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东魏北齐邺城和太原两都的交通要道。”^[8]对于这些小型石窟的具体分布情况，李裕群说：“考察这些石窟的地理位置，我们不难发现，石窟地点或在古代交通线上，或在中心城市附近。如晋东南的高平羊头山、高庙山石窟、武乡良侯店石窟、晋中子洪镇石窟都在太原到洛阳的交通干道上，榆社圆子山石窟和响堂寺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和‘高欢云洞’石窟，既在太原到洛阳的交通线上，也在太原到邺城的交通线上。平定开河寺石窟则在太原东出井陘，连接河北诸州的交通要道上。这一交通线上还有许多北朝石窟。”^[9]



图三 武乡良侯店石窟东壁左侧坐佛与菩萨

对于这些小型石窟的具体交通状况,李裕群说:“由于并州、建州(引者注:今高平)是联系两京(平城和洛阳)重要的交通要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由平城率军南征,就是经由太原和建州而抵洛阳的。迁都洛阳后,北魏官员亦常冬居洛阳,夏居平城,而频繁往来于两京地区。沟通两京的交通要道主要在太行山东西两条路线,太行山东线虽较平坦,但西麓一线却(较)为便捷,路程亦短,故这一交通线似更为繁忙。”^[10]

李裕群是连带东魏北齐小型石窟一起叙述的,转引时难以将北魏情况单独抽离出来,不过东魏北齐连带引述,倒也有助于凸显平洛道上北魏石窟与太邺道上东魏北齐石窟的不同。

从理论上来说,平洛道上石窟不是云冈影响下的产物,就是龙门影响下的产物,由于龙门石窟主要是在云冈影响下兴起的,所以平洛道上石窟总体上都可以看作云冈影响下的产物,这与河西石窟很不一样。这个宏观背景是易于理解的,但面对具体材料时,这个宏观背景往往又是容易被忽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洛道上的有些石窟年代李裕群认为要早于迁洛,从而被视为云冈对外产生影响的重要证据,“晋东南地区发现有北魏都平城时期的石窟造像,年代上早于洛阳龙门石窟,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11]

当时引起李裕群极大关注的是武乡良侯店石窟、高平羊头山 E—2 龕和祁县子洪镇第 2 窟,特



图四 高平羊头山石窟 F 区双佛并坐

别是良侯店石窟。李裕群将这几处石窟划分为第一期石窟,认为它们在形制上与云冈和龙门石窟无法对应,因而主要从造像和装饰特征上进行讨论,因为体现了分析的方法,所以下面作较多转引:“本期佛、菩萨和飞天造型古朴,具有早期造像的特点。如良侯店石窟佛像面相浑圆,广额丰颐,双耳垂肩,身体丰壮,身着袒右式袈裟,显得较为古朴。袒右袈裟左肩处均有较宽的袈裟衣边,衣纹带有钩形分叉的厚重衣纹,明显具有北魏迁洛前云冈第一、二期佛像的特征。……因此良侯店石窟的开凿年代可以推定为北魏迁洛前,约孝文帝太和中期前后(486 年左右)。”^[12](图三)关于羊头山石窟,李裕群说:“羊头山 E—2 龕佛像宽肩细腰,身体硕壮,身着袒右式袈裟,有偏衫衣角,衣边有折带纹。这种样式属于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前的旧样式,是云冈石窟第一、二期常见的佛像样式。在龙门石窟古阳洞造像中似延续到宣武帝景明年间,以后完全为褒衣博带式新样式所取代。因此羊头山早期龕像的开凿亦约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中期至宣武帝景明年间以前(486—504 年)。年代上略晚于良侯店石窟。”^[13](图四)关于子洪镇石窟,李裕群说:“子洪镇第 2 窟佛像面相浑圆,身着袒右式袈裟,也具有早期特征,佛像发髻旋涡水波纹与北魏太和八年(484 年)比丘僧安金铜造像发髻一致,因此从佛像样式而言,子洪镇第 2 窟的开凿年代也约在北魏孝文帝时期。”^[14]李裕群



图五 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

将这三处石窟作结：“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将一期的年代大致推定为北魏孝文帝太和中期至宣武帝景明年间，即公元 486 年前后至 504 年。三处石窟的先后开凿次序是良侯店、羊头山和子洪镇石窟。……看来第一期洞窟主要来自于云冈石窟的影响。……与洛阳地区石窟寺相比，第一期洞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年代上洛阳地区石窟寺亦略晚于第一期洞窟，因此不存在受到洛阳地区石窟寺的影响问题。……第一期洞窟主要受到北魏都平城时期的云冈石窟的影响，可以视作‘云冈模式’向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15]

李裕群发表《山西北朝时期小型石窟的考古与研究》一文时，高平大佛山尚未被发现。在后来公布大佛山材料时，李裕群直接将大佛山作为云冈对外影响的重要佐证，并在标题中直接点明，其名曰《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在正文中李裕群有更多的阐释：“大佛山摩崖造像与云冈第二期偏早阶段

的洞窟造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题材布局，还是造像样式都如出一辙。这是高平地区首次发现与云冈如此类同的摩崖造像。从表面上看，云冈模式南下影响到了高平地区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工匠的身份或来源问题。”^[16]（图五）具体说来，李裕群用大佛山摩崖与高平羊头山石窟的大型释迦多宝龕、高平建宁乡北魏太和二十年（496 年）“邑子等为皇帝陛下造石像”四面造像碑进行了比较，认为羊头山遗存属于当地民间工匠所为，“我们认为雕造大佛山摩崖龕像的工匠极有可能来自于平城，并且曾经参与过云冈石窟的开凿。”^[17]

李裕群关于良侯店、羊头山、子洪镇、大佛山摩崖或石窟受到云冈影响的判断有理有据，关于大佛山工匠来自云冈的推测也有说服力。但是，关于这些遗存年代在迁洛之前的判断似乎仍有讨论的空间，事实上还存在着晚于迁洛的可能，至少对高平地区的羊头山石窟和大佛山摩崖而言。将这些遗存作为“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也需要斟酌。

李裕群进行年代断定的主要方法是造像特征的相互比较，我们认为历史地理状况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高平地区属于晋东南地区的东南部，这里的地形呈簸箕状向南倾斜，丹河纵贯其间，丹河河谷是沟通黄河北岸与太行山南麓的重要通道，迁洛以后，这里成为平洛道上的重要节段。但在迁洛之前，高平地区距离平城遥远，而且路途崎岖。不仅如此，在孝文帝仓促决定移都洛阳之前，洛阳地位低落、经济萧条，没能从魏晋疮痍之中恢复过来。合此两点，可见高平地区在迁洛之前没有与平城和洛阳沟通的必要和可能，这里为偏僻闭塞之区，佛教石窟这样的高级文化现象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个地区，何况羊头山和大佛山的规模也较可观，绝非很乡间的小龕小像可比。羊头山 E—2、大佛山具有的云冈一、二期因素不能作为其时代一定早于迁洛的证据，这一点其实李裕群在涉及古阳洞具有云冈一、二期特点的造

像时,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那就是李裕群根据题记等材料也指出古阳洞一些带有云冈一、二期特征的佛龕年代可延续到宣武帝景明年间。但在具体讨论到羊头山 E—2、大佛山的开凿时间时,李裕群更多地依靠造像特征,选择了更早的时间点,这就与历史地理状况产生了冲突,但李裕群没有涉及这一点。李裕群的这个时间点选择是与“云冈模式”南传问题密切相关的,这是对宿白先生云冈对外产生巨大影响话题的呼应。我们在这里还想再次指出,孝文帝迁洛是比较仓促的偶然之举,云冈影响到平洛道及洛阳都与正常的文化自然流动不太一样,不宜作为“云冈模式”外传的典型例证。

其实,良侯店和子洪镇石窟也有可能是在迁洛之后开凿的。两处地点在平洛道以及后来的太邳道上都是重要节点,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除了李裕群认为可能早于迁洛的这两处地点外,没有其他可以肯定的迁洛之前遗存。与这两个地点邻近的是沁县南涅水石刻,数以百计的造像遗存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永平三年(510年),这在推测良侯店和子洪镇石窟年代时是不能不顾及的。这里其实涉及的是迁洛之前平城与华北平原沟通的路线问题。相关文献记载和历史研究早已梳理得很清楚^[18],从平城去华北平原,主要走灵丘道,今山西灵丘的“文成帝南巡碑”就是最好的证据。从灵丘道可以很快到达北魏重镇定州以及邺城。如果从祁县、武乡再沿漳河河谷即“滏口陉”而东出太行,那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什么必要。

因此,比较合理而非流于造像表面特征的推测是,良侯店、子洪镇、羊头山、大佛山都是伴随着迁洛而出现的石窟,而且是较早出现的石窟,所以保留了较多的云冈一、二期造像特点。为什么没有将与迁都时间更接近的云冈二期晚段,即褒衣博带式的造像更多地雕造出来,这个话题似乎更为诱人,更需要回答。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云冈石窟借助迁洛传播到晋东南地区,似乎更好地说明了迁洛之前云冈对外影响有限。

三、云冈三期洞窟与龙门石窟之关系

孝文帝迁洛以后,云冈才对外产生显著影响。这个时期的云冈石窟进入了第三期,呈现出第二期既有继承,又很不一样的地方。继承者主要体现在造像的组合和布局方式,很不同者主要体现在流行方形窟形、有佛坛、秀骨清像的造像形态以及建筑新样式等方面,这些新特点龙门同样存在,这就牵涉到云冈与龙门的关系,即何者影响何者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宿白先生有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云冈影响了龙门。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还是龙门影响了云冈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到准确评估云冈的对外影响状况,所以我们对可能是龙门影响了云冈而不是相反要适当进行阐释。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必要先介绍宿白先生研究的大致内容。宿白先生首先对云冈三期洞窟进行了仔细的考古类型学分析,并根据有关铭文得出“可以推测宣武一代云冈雕凿尚未衰落”^[19]的认识。由此宿白先生结合文献提出三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1. 迁洛以后的平城并未荒废。2. 迁洛以后,对云冈开窟的实力,应作如实的估计。这一点的主要内容是云冈石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技艺力量,而洛阳至少在永平(508—512年)之前,龙门没有大规模开展,不需要太多雕刻技艺,因此云冈可以继续兴建。3. 孝明(516—528年)以来洛阳佛寺工程急剧扩大与平城、云冈的衰落。这一点的主要内容是,龙门开凿的盛期始自孝明,云冈的衰落在正光年间,正光四年(523年)柔然抄略平城,《魏书》与《金碑》的记载呼应^[20]。宿白先生还列举了几项比较显著的重要特征,如:“三壁设坛窟,在云冈既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与A型窟关系密切,如第23窟(22);又可以了解窟形向方形发展的趋势。在洛阳龙门这种窟形来源、发展俱不清楚,远离龙门的新安西沃第1窟似乎才提供了它的发展趋向。”^[21]在确认了云冈在迁洛之后雕凿活动不衰,龙门的兴盛期在孝明



图六 龙门石窟宾阳南洞正壁



图七 左权石佛寺第 1 窟正壁

之后，宿白先生对云冈与龙门的关系进行了正面阐释：“洛阳地区孝明时期开凿的中小窟室，主要有接近方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三壁设坛和三壁三龕两种形制；亦即云冈第三期的 B 型窟和 C 型 c 式窟。云冈这两种形制窟室的出现都比洛阳为早；而且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组合，形象造型以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云冈不仅早于洛阳，更重要的是，其演变程序完整、清楚，与洛阳颇多突然出现或消失的情况不同，这就更有力地说明了变化的来源，主要出自云冈，而不是云冈较多地接受了洛阳影响。……以上情况可以表明，从窟室形制到细部装饰，凡云冈、洛阳所共同具有的，主要应源于云冈。当然也不必排除在云冈第二期窟室进一步汉化时，吸取了某些中原因素，但从窟室整体观察，应该考虑洛阳地区北魏窟室样式，无论孝明以前，抑孝明以后，其主要来源应是云冈，而洛阳孝明以后的北魏窟室的主要特征，应属于云冈石窟的第三期样式。”^[22]

宿白先生结合宏观历史背景，提示龙门与云冈相似的因素，就需要考虑来自云冈，这是很有启发性的，但可能还要附加一个前提，那就是明确的云冈因素，才能考虑从云冈到龙门。还有，三壁设坛窟是否能从云冈 A 型演化而来，云冈三壁三龕窟是否能早到宣武帝时期，都还有讨论的余地。这里仅就佛坛略作讨论。宾阳南洞虽然没有完工，但系宣武帝为孝文昭太后所开，开凿年

代可能同时或略晚于宾阳中洞，而且这样的窟最初必然有统一的设计。现宾阳南洞窟门附近壁面下部有神王，表明现在的地面就是北魏时期开窟的地面。正壁佛像经唐初修改而成，但布局和大致形态维持北魏时期状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佛座前面有一唐代特点的蹲狮，这表明唐之前蹲狮所在山石还保留着，现在看到的佛座以及旁边的菩萨弟子莲花座都很高，都是唐初为了将这里与洞窟前部地面找平时而形成的，这个地面也是北魏当时设计的地面而没有完成（图六）。两尊菩萨的莲座已经完成，是北魏特点的大扁莲花，按照宾阳中洞、莲花洞等北魏洞窟特点，略低于大扁莲花座就应是一个连续的界面或地面，那么，宾阳南洞正壁当初的设计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为通壁的高佛坛，一是佛座与菩萨弟子座隔断，但佛座和菩萨弟子座都很高。前一种情况在龙门后来的北魏洞窟中有不少例，如皇甫公窟、路洞、魏字洞正壁。后一种情况在龙门未见，但见于大约同时期的南京栖霞山石窟，两处石窟之间关系密切，详下。总之，根据宾阳南洞，可推知高佛坛有可能在公元 505 年后不久就在龙门出现了，大概不待云冈之传入。再者，即使我们接受龙门石窟在孝明以后方始大盛的认识，从孝明登基到正光四年平城衰落之间有约十年的时间，这个十年是龙门和云冈石窟都蓬勃发展的时期，更是龙门佛教活动大发展的时期，从地位日益提高的龙

门向云冈输送石窟因素既合理,时间也足够。在平洛道上的北魏晚期洞窟如高平七佛山、高平石堂会、高平高庙山、高平羊头山、长治交顶山、榆社圆子山、榆社响堂寺、左权石佛寺等如果都理解成云冈向龙门传送影响之下的产物,是与洛阳地位日高而平城地位日低相违背的,何况有些特征还明确指向龙门而不是云冈,如左权石佛寺第1窟维摩诘和文殊的形态是龙门式的(图七),与宾阳中洞维摩文殊对谈相似。宾阳中洞是一处整体设计和完工的洞窟,开凿年代为公元505年,其中的维摩文殊对谈形象一扫云冈旧貌,而不可能由云冈的维摩文殊旧貌变化而来,这决定了与宾阳洞接近的左权和云冈维摩文殊新样都只能来自龙门。

宿白先生讨论云冈三期与龙门关系时,很多材料还没有发现和公布。仅就两处石窟而言,而且局限于石窟材料内部进行讨论的话,得出云冈三期影响了龙门石窟的认识是当时最佳选择。但正如我们上文提及的平洛道上小石窟材料,已显示出的云冈与龙门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超出通常的想象。南京栖霞山石窟材料的再发现和相关研究,使重新考察云冈和龙门的关系成为可能。上世纪80年代末,宿白先生就发表了著名论文《南朝龕像遗迹初探》^[23]。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京栖霞寺僧大做功德,将20年代敷覆于南朝石窟造像上的水泥凿去,南朝龕像面貌得以大致展露,林蔚发表了《栖霞山千佛崖第13窟的新发现》^[24]一文,对此窟南朝造像特点进行了详细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有关高校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启动“南京栖霞山石窟考古课题组”,并撰写了考古报告《栖霞山·千佛岩》,惜至今仍未正式出版,但栖霞山石窟材料已广为人知。魏正瑾、白宁将《栖霞山·千佛岩》的主要内容和结论节录为《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一文发表,对栖霞山、云冈、龙门三处石窟的关系有所讨论,“栖霞山南朝一期(引者注:南齐时期)石窟佛造像的衣纹,与云冈、龙门的北魏石窟在雕刻技艺、纹饰样式上是一致

的,而在质感风格和纹饰的细部表现方面则有所区别。……云冈者显凝重厚实,栖霞者显轻薄飘逸,龙门者似有承继栖霞之风的迹象。”^[25]

近年则有费泳的研究最为深入,费泳将发掘出土的陈《江总碑》有关记载与栖霞山石窟现存龕像进行了对应,认为:栖霞山下20窟(此为费泳编号,下同)即无量殿对应的记载为“……造,齐文惠太子随喜,齐豫章献王随喜,齐竟陵文宣……未明宝寺十五人”;下21窟、下22窟对应的记载为“齐雍州刺史田免为巴陵王造……沂令明仲璋造”;下024窟(即三佛窟)对应的记载为“宋太宰为霍夫人造未成”;下019(即双佛窟)对应的记载为“梁东阳(扬)州刺史番禺”^[26]。费泳认为下024窟所涉太宰为宋江夏王刘义恭,其死于宋永光元年(465年),“说明宋太宰所造龕像工程应已显大略,但未能竣工”^[27]。这将栖霞山石窟始凿年代从以往认为的南齐提前到了刘宋,且与云冈始开年代接近。下024窟平面呈方形,三壁三佛,每壁主佛佛座与二胁侍菩萨的莲座各自独立而紧靠在一起(图八),龙门宾阳南洞正壁造像的整体布局与此相似,只是佛座与菩萨座之间有较大空隙,不知是否因为宾阳南洞规模很大,



图八 南京栖霞山石窟千佛崖下024窟内景



图九 南京栖霞山千佛崖下 020 窟无量殿大佛

所以能表现出间隙来。下 024 窟的这种布局可能表现的是刘义恭始创时的形态，“……汉地以 5 世纪中期前后为界，坐佛躯干高和宽之间的比例普遍发生变化，表现为由上身方短向上身修长转变。这在古印度秣菟罗佛像由贵霜向笈多的风格转变中发生过。汉地，约 5 世纪中期以后，佛像身軀较之前渐趋拉长。下 024 窟（三佛窟）正壁及东西侧壁分别雕一坐佛，三坐佛的躯干高、宽比例，明显较下 022、021、020、019 四窟坐佛要短许多，所以发生时间应更早。宋太宰江夏王义恭死于永光元年（465 年），下 024 窟的三尊坐佛应在义恭死前已开凿躯干的大形”^[28]。关于下 026 窟的年代，“下 026 和下 024 两窟毗邻，坐佛躯干高宽比例类同，二者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又有别于其他龕像，应视为同期造像”^[29]。关于下 021、022 的年代，“下 021、022 两窟主尊高度相似，……若依据阎文儒先生的考证，‘田免’应为‘王免’，《南齐书》卷三《武帝》载，王免于齐永明九年（491 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齐永明十一年（493 年）伏诛。……下 021 或下 022 两窟中的一窟应建于 491 至 493 年之间。下 021 窟主尊造像损坏严重，造像细节无法辨识。下 022 窟的佛衣样式为‘褒衣博带演化式’，躯干较下 024 窟明显拉长，发生时间定在 6 世纪上半叶似更合理。这样看来下 021 窟便更有可能是 5 世纪末王免所造”^[30]。费泳扼要总结到：“下 022、021、020、019 四窟为一组，其开凿以无量

殿为中心向左右两侧延伸，无量殿主尊约建于 5 世纪末，在 6 世纪初被改造。下 021 较无量殿开凿时间相近或略晚，约为 491 至 493 年，接下来开凿的为下 022 和下 019 两窟，约建于 6 世纪上半叶和 6 世纪中期。”^[31] 费泳将下 024、026 窟的年代向前调整，将下 019、022 窟的年代略向后调整，维持无量殿大佛为南齐时期的既往判断，就这一核心点来说，费泳与前人没有根本分歧，但增加了栖霞山石窟在时间轴线上的丰富性。与本节主题相关，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下 020 窟即无量殿大佛坐于通壁的高坛上（图九），这在时代略晚的下 019 双佛龕中得到延续。下 021 窟正壁主尊两旁现存佛坛为石块砌成，不能判定是否本来就是如此，但这不妨碍通壁佛坛存在于栖霞山石窟且早于龙门石窟的事实。

尽管栖霞山石窟远不及龙门北魏窟丰富，但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栖霞山石窟当给予了龙门石窟直接的影响，这不只是佛、菩萨的形态和服饰特点相似的问题，也不只是两地都有通壁佛坛而栖霞山更早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寺院造像布置方式和建康文化对洛阳影响程度的问题。石窟的形制和布局本质上是佛殿内部状况的反映，通壁佛坛一则可能表明南方佛座较高，这从胁侍菩萨的莲座多为两层莲花可推知，一则可能表示当时佛殿中一铺造像的陈列方式。这种陈列方式见于龙门北魏窟和云冈第三期，不见于云冈第一、二期，但在栖霞山出现得较早，以栖霞山石窟为龙门的源头，并从龙门再传播到云冈，自然要比认为从已经走下坡路、且本来没有这种陈列形式的云冈产生并逆势传到龙门要更说得通。至于说从大的历史背景上，建康给洛阳以巨大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栖霞山石窟影响到龙门石窟只是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方面而已。如果不限于石窟，就会看到不少细节更能反映龙门石窟与南方文化的关系，以宾阳中洞为例，虽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32]，但这大概只是笼统而言继承在平城为新故帝王造窟的传统，并在佛像特征上尽可



图一〇 宾阳中洞顶部飞天

能保留点鲜卑人特征以象征皇帝,在其他方面,如菩萨的装饰、帝后礼佛图、维摩文殊对谈都与云冈差异显著,不能不将之归结为迁都洛阳后向南方学习模仿的结果。宾阳中洞窟顶的飞天或许更能说明南北文化的交融,一种飞天作蹬腿飞行的姿态,还保留着云冈特点,但飞天的颈后的飘带呈曲折的三角状,将其与南方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图一〇)。

综上,我们不否认北魏迁洛以后,云冈还可能对龙门有一定的影响,但比较强烈的影响如古阳洞所见,肯定是短暂的。在云冈全面进入第三期以后,云冈对龙门的影响也还会有,但必定是轻微和极其局部的,龙门和云冈表现出的共同点,主要应该是龙门传递给云冈而不是相反。这不仅是因为作为新都的洛阳不断发展而旧都平城在不断退步,更主要的是孝文帝迁洛以后得以放手汉化,全面向南方学习。在都城建设上派遣蒋少游去建康名为观礼实质偷学的故事广为人知,大体上也属于都城建设一部分的石窟也模仿南方实在情理之中。以宾阳中洞为代表的帝王窟充当了汉化的先锋,其他洞窟自然唯帝王窟是从。从三壁三龕的窟形和布局方式,到通壁的高坛,再到佛和菩萨的形态和服饰,保存状况欠佳的南京栖霞山石窟仍然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以栖霞山为代表的南方石窟和南方文化直接影响到

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又传递给了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第三期表现出很多新特征,近源在龙门,远源则在栖霞山石窟。

小 结

综上所述,云冈石窟对河西地区没有产生过多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如宿白先生所言是巨大的,从宏观上来说东部地区石窟几乎都受到过云冈石窟的滋润。尽管如此,云冈石窟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需要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进行具体评估,平洛道上小型石窟接受云冈影响的时间可能在迁洛之后,云冈先影响龙门然后龙门又影响云冈,所反映的情况不只是石窟本身,更与历史状况和自然地理之间存在关系。只有全方位考虑,我们才可能对北魏首都从平城迁移到洛阳所引起的石窟乃至文化上的变迁情况有更为客观公允的认知。

- [1]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载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 [2] 暨远志的论述见于其相关论文:《酒泉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张掖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张宝玺的论述主要见于其所著《河西北朝石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一书第八节“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部分。
- [3] 参见拙文:《北中国视野下的河西早期石窟——河西早期石窟研究下》,《敦煌研究》待刊。
- [4]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
- [5] 参见宿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中的有关论述,载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6~243页。
- [6] 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之“四 从新发现的绣佛估计现存最早洞窟的年代”,载氏著《中国石窟》(下转第105页)

- 2018 年,第 11~13 页。第 11 页铜壶与金胜 M673 出土铜壶完全相同。
- [27] 关于该壶的讨论文章非常多,在此选代表性观点简要介绍。a. 陈梦家:《禹邛王壶考释》,见《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 年。b. 唐兰:《赵孟庠壶跋》,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 [28] 金胜 M674 的纹饰组合,还见于侯马铸铜遗址 T81H126、T81H429。可从侧面说明其风格一致。
- [29] 李夏廷、李邵轩:《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 51、52 页。
- [30] 关于该鉴具体的尺寸数据,《中国青铜器全集》记录为通高 22.7 厘米,宽 51.8 厘米;“Chinese ar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ange and continuity”中记录为:通高 22.8 厘米、宽 51.7 厘米;唐兰先生的《智君子鉴考》中记录为:高 0.224 公尺(米)、(口)径 0.43 公尺(米)。三者所记相差不大,若以口径 43 厘米计算,则智君子鉴口径与高之比约为 1.9,介于牛家坡 M7 与分水岭 M25 铜鉴之间。
- [3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 年,第 250 页。报告仅介绍 3 件残模、范标本。
- [32] 唐兰:《智君子鉴考》,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智氏一族于公元前 453 年被韩赵魏三家灭亡,显然不能晚于公元前 453 年铸造智君子鉴。
- [33] (汉)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161 页。学界对赵简子卒年的讨论有许多,前后相差约 20 年。
- [3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301 页。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9 世纪中叶至公元前 5 世纪中叶。
- [35] a. 张崇宁:《太原金胜村 251 号墓主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1 期。b. 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 年。
- [36] 戟一般包括戟刺和戟身两部分,本文所列铜戟均有较为明确的出土环境和组合形态。除此之外,本文皆称矛。
- [37] 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41 页。
- [38] 林已奈夫:《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 年。
- [3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370 页。

(上接第 51 页)

- 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20、221 页。
- [7] 龙门石窟的始凿年代在孝文帝迁洛之前还是之后,一直有不同看法,蒋仁和最新发表的论文,支持孝文帝迁洛之前龙门已经开凿,并列举了更多的支持材料,可参看。Katherinae Renhe Tsing: A Revisionist Reading of the Transition of Buddhist Cave-Making from Yungang to Longmen, Archives of Asian Art 71:2 October 2021. p131~170.
- [8] 李裕群:《山西北朝时期小型石窟的考察与研究》,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 27 页。
- [9] 同[8],第 49 页。
- [10] 同[8],第 50 页。
- [11] 张庆捷、李裕群、郭一峰:《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63 页。
- [12][13][14] 同[8],第 48 页。
- [15] 同[8],第 48~52 页。
- [16] 李裕群:《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文物》2015 年第 3 期,第 91 页。
- [17] 同[16],第 92 页。
- [18] 参见[日]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四章第五节“平城至河北平原的交通路线”,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179~232 页。
- [19] 同[1],第 139 页。
- [20] 同[1],第 139~142 页。
- [21] 同[1],第 143 页。
- [22] 同[1],第 142~144 页。
- [23] 宿白:《南朝龕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 年第 4 期。
- [24] 林蔚:《栖霞山千佛崖第 13 窟的新发现》,《文物》1996 年第 4 期。
- [25] 魏正瑾、白宁:《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石窟寺研究》(第二辑),2011 年,第 201 页。
- [26] 费泳:《六朝佛教造像对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影响》,中华书局,2021 年,第 119 页表 3-1。
- [27] 同[26],第 121 页。
- [28] 同[26],第 129~130 页。
- [29] 同[26],第 131 页。
- [30] 同[26],第 134 页。
- [31] 同[26],第 140 页。
- [32] 同[4],第 3043 页。